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 一、山雨欲来 谁主沉浮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上海，光怪陆离。

黄浦江上，停满了外国轮船和兵舰。码头上客旅川流，熙来攘往，货物上下，纷纭沓至。码头周围，烟馆、赌台、妓院林立。浓妆艳抹、妖冶轻浮的女人与面色饥黄、破衣褴衫的儿童，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花园洋房与低矮拥挤的破烂棚户，形成了一个难以言状的上海滩。作为中国沿海十分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上海呈现出一派畸形的繁荣景象，人称“十里洋场”。

在上海，有一片很特殊的地界，这就是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列强强行开辟的“租界”，它是独立于中国行政和法律管辖之外的特别地域，被称作“国中之国”。在“租界”内，统治权完全属于外国人，他们可以建造礼拜堂、医院、坟地等，“租界”内的中国居民，是西方殖民者的“臣民”，他们不仅要向殖民当局纳税，而且一旦触犯了殖民者的利益，均要受到严厉惩罚。更有甚者，就连中国人民的诉讼案件，都要由外国人设在“租界”里的会审公廨进行审理、判决。上海滩上，高鼻碧眼的洋人趾高气扬，不可一世。黄浦公园的门口竟然醒目地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

侵略中国的各个帝国主义国家，都对上海表现出极大的兴致，许多轮船公司在此设有码头。上海成了帝国主义冒险家的乐园。他们在这里大量倾销商品，掠夺原料，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特别是将鸦片烟进口的大本营从广州转至上海之后，帝国主义者麻痹中国人民的精神、摧残中国人民身心的同时，将无数黄金、白银源源不断地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上海，还是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各派军阀的必争之地。当时统治中国的军阀主要有三股势力。一股是以东北为大本营的张作霖的奉系军阀，包括张宗昌的奉鲁军；一股是盘踞中原的吴佩孚的直系军阀；还有一股军阀是从吴佩孚那里分化出来的孙传芳。这些军阀，各有帝国主义列强做靠山，相互之间，明争暗斗，内战不息，致使国无宁日，民不聊生。

孙传芳在英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占据了包括上海在内的长江下游东南沿海的富饶地区。他依仗英帝国主义的支持，加上拥有以新式武器装备的军队，对上海的广大人民实行黑暗而残酷的统治。为了保证巨大的军费开支，他拚命地搜刮民脂民膏，攫取财富，将战争的代价转嫁到广大劳动人民身上。

在帝国主义控制之下的上海，资本输出是列强掠夺财富的重要形式。为此，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家在上海开办了各种工厂，直接对中国工人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榨。到 1925 年，仅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开设的纱厂就有 32 家之多。

同时，一些民族资本家也相继来到上海开办工厂。上海既有逐步开始发展的民族工业，也有已具雏形的金融基础，还有较为发达的商业贸易系统。这样，在上海就形成了一支力量可观的工人阶级队伍。为了谋求生路，大批破产农民也从四面八方纷纷涌到上海，进入工厂做工。上海成了中国工业无

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20年代，上海有产业工人80万，占全国工人总数的1/3。

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双重压榨、剥削下的上海工人，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他们每天超负荷地工作，被折磨得精疲力竭，却只能领取最低的工资；他们生活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还经常被资本家任意克扣工资、滥施体罚，遭受百般虐待和侮辱。

上海的工人，以纺纱工人占大多数，他们的生活状况，最足以代表一般的劳动阶级。据当时的报纸披露，由于物价飞涨，收入微薄，上海的许多纱厂工人维持生计已是难题。他们衣不蔽体，更无房屋可住，只好搭竹棚，或架草屋，有的干脆就寄住在船上。每当夏季来临，由于空气不通，蚊蝇臭虫繁生，工人死于传染病的比例很高。至于防火条件，更无从谈起，如遇火灾，工人只有束手待毙。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重，反抗愈烈。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开始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抗与斗争。

1925年，在全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这次运动，势不可挡，很快席卷全国，成为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序幕。

1926年5月，在五卅运动周年之际，上海人民又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五卅周年纪念活动。之后，纪念活动转化为罢工斗争，并且由单独工厂罢工发展到同盟罢工，从经济斗争上升到政治斗争，形成了罢工高潮。仅1926年6月至8月间，就发生罢工120次，参加罢工的人数达20万之众。

此时，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促进下，全国形成了一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1926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力促与帮助下，加上全国爱国力量的响应，广州国民政府开始了以“打倒军阀”为直接目标的北伐战争。

山雨欲来风满楼。在北伐战争革命形势的影响下，在此起彼伏的罢工高潮中，上海工人正酝酿着一场更深刻、更大规模的革命斗争风暴。

由于张、吴、孙等大军阀之间勾心斗角，各怀阴谋，无法统一行动，因此北伐军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向前推进。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开展，诱发了上海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推翻孙传芳的统治、获取政权的欲望。其中，最积极的人士当属虞洽卿。

虞洽卿是上海总商会前会长，曾遭到孙传芳一而再、再而三的排斥和打击。他对孙既恼火又奈何不得。随着北伐军长驱直入，虞洽卿感到，机会来了。于是，他开始极力联络共产党，希望共产党帮助他取得上海政权。

与虞洽卿同样活跃的，还有到上海不久的国民党军事特派员钮永建。他四处活动，号召工人在他的号令下，行动起来，通过暴动夺取上海政权。茫茫上海滩，形势复杂，在政权更替之际，将谁主沉浮？

在形势的发展变化中，设立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及中共上海区委根据实际情况，领导着上海人民的革命斗争。

中共上海区委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区委员会的简称。上海区委所领导的党的地方组织，除了上海市以外，还包括江苏和浙江两省，这也正是孙传芳统治地区的中心。

当时，中共上海区委的主要负责人是罗亦农和赵世炎，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杰出的社会活动家。罗亦农担任中共上海区委书记，赵世炎任区委组织部长兼上海部工会党团书记。在上海区委的领导下，具体组织和指导工人运动的是上海总工会。

自北伐战争开始以后，中共上海区委就一直密切地注视着战争的发展，并积极开展活动，准备以实际行动迎接国民革命军的到来。8月底，北伐军抵达武昌城下，上海区委分析当时的情况，于9月3日召开了主席团会议，决定在上海开展自治运动。区委书记罗亦农说：“上海是一个最复杂的社会，有帝国主义者、有买办阶级、有官僚、有中小商人、学生、工人等各个阶级阶层。各个阶级阶层都有自己的要求。而人民自治的口号是能够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我们要通过开展自治运动，建立起从虞洽卿起一直到工人的联合阵线，反对孙传芳的统治。”

罗亦农的发言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同意。一场以打倒孙传芳、建立自治政府为目标的自治运动在上海展开了。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自治运动之初，主要依靠以虞洽卿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可是资产阶级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当北伐军节节前进时，虞洽卿等人立即表现出热烈欢迎北伐军的态度。不久，北伐军中路军在江西战场上失利，虞洽卿便消沉了，不愿出来活动了。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以后，上海的自治运动又重新高涨起来，大中小资产阶级感到形势有利，要求自治的呼声随之高涨，包括孙传芳的鸦片经理、英国帝国主义的买办邬志豪等人，在一片自治声中，也振臂高呼：“自治！自治！”

通过自治运动，上海各阶级各阶层被普遍发动和团结起来，打倒孙传芳，建立自治政府已经成为上海人民的普遍共识，而且呼声越来越强烈。

## 二、一次没有起义的起义

凶残、腐朽的北洋军阀势力已是外强中干，加上北伐军英勇善战，所向披靡，特别是以共产党员叶挺为团长的独立团更是勇不可挡，因此北伐军势如破竹，节节胜利。9月，北伐军攻入江西，对号称“浙、闽、苏、皖、赣五省总司令”的直系军阀孙传芳发起猛烈攻击。

北伐军入赣后，孙传芳按捺不住了，立即撕去过去“保境安民”的伪装，露出反革命的真面目，调兵遣将，分三路将主力部队投入了江西战场。

孙传芳调兵，造成上海守备空虚，是一个相当好的武装暴动机遇。如果

上海武装暴动了，便可以动摇乃至推翻孙传芳在上海的统治。

根据形势的发展，上海区委决定在领导自治运动的同时，着手组织上海民众进行武装暴动。

1926年9月，根据苏联领事馆的电报，上海区委确知北伐军已经占领武昌与汉阳，罗亦农在区委主席团会议上提出：“上海地方非有一次民众的暴动不可，要特别注意军事工作。”

为了集中力量搞暴动，区委主席团决定结束上海正在开展的大罢工。上海总工会负责人汪寿华对此十分赞同，他说：“组织一次暴动是十分必要而迫切的，要马上开始组织，并且组织2000人的纠察队作为暴动的基本力量。”

统一了认识，一场民众的武装起义开始紧锣密鼓地加紧筹备。

与此同时，广东国民政府派出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钮永建，作为驻沪特派员，也在积极活动，准备以暴动形式夺取上海。

钮永建来上海前，曾先到杭州，与孙传芳属下的浙江省省长夏超谈判。双方约定，夏超在杭州宣布独立，脱离孙传芳，接受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之职，并向上海进军。届此，钮永建在上海，依靠工人和学生，组织暴动，里应外合，夺取上海。

钮永建到上海后，在法租界环龙路（现南昌路）志丰里五号设立了办事机关。他首先通过上海滩赫赫有名的青帮头子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等人，组织起一支由流氓无产者、落伍军人及青帮分子为骨干的武装力量。

钮永建还主动派代表与中共方面联系，了解上海的工人和学生力量。中共派出上海总工会代表汪寿华与学联代表林钧与之会晤。

钮永建的代表问：“上海工人的实力如何？”汪寿华告诉他们：“我们可有1500人的武装。”

钮永建的代表听了，非常轻敌地答道：“我们只要有50人肯勇往直前，视死如归，群众就可以被鼓动起来，而使对方畏惧，不必一定要1500人。”

接着，汪寿华表示：“上海的资产阶级对反对孙传芳表现了积极性，我们希望资产阶级也参加武装暴动。”

钮永建的代表立即表态：“不管几方参加，现在钮先生来了，应听从他的指挥。”

双方初步议定：国共联合，共同组织暴动。

10月中旬，曾与钮永建秘密谈判的夏超，眼见孙传芳在江西的战事屡屡失利，南昌被围不解，主力已丧失过半，感到这正是起兵举事宣布独立的极好机会。16日，夏超正式接受了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的任命，解除了孙传芳在杭州仅有的200名宪兵队的武装，公开宣布浙江独立。

夏超起义，加速了国共合作在上海联合暴动的发生。17日，钮永建表示，要听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统一指挥，依靠工人、学生的力量发动暴动。至此，国共合作发动第一次武装起义的方针正式确定。为了避免帝国主义借口反赤，进攻和屠杀工人阶级，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将以虞洽卿为代表的资

产阶级，推上武装起义的领导地位。

17日，夏超调集了3000多警备队，整装待发，准备进军上海。当日下午4时多，1500余名警备队乘专列进驻嘉兴，晚9时左右，1600名警备队，也乘专列向松江进发，打算控制上海到杭州的水陆交通。18日，夏超部队占领松江，逼近上海，引起守备力量薄弱的上海军阀政权的一片恐慌。

但是，狡猾的孙传芳对夏超早已存有戒心。夏超刚有举动，孙传芳便迅速将驻防长江两岸的李宝章旅调到上海，随后调宋梅村旅到嘉兴。宋旅大军压境，22日到达杭州，夏超慌不择路，弃城出走。很快，孙传芳的军队接管了浙江省署，夏超的保安团被缴械，夏超本人在逃至杭富路上，被人开枪打死。

由于当时通讯条件极差，中国共产党方面及联合起义领导机关方面，都没有及时得到夏超起义失败的消息。当时上海还到处流传着北伐军攻克九江的消息，中共上海区委对此传闻信以为真，对形势估计十分乐观，因此积极组织各方面力量准备起义，特别是推动虞洽卿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出来领导起义。

可是，在临近起义，需要拿起枪实干时，资产阶级却害怕了。资本家聂垂生等人在起义前就表示不参加，虞洽卿等人也不干了。他们或登报声明“在商言商”，或找借口到外地躲避风头。国民党代表钮永建，在起义的关键时刻，也犹豫动摇了。直到起义前夕，中共上海区委与上海工人阶级才主动地承担起发动起义的责任。

由于钮永建一直持观望态度，所以直到决定起义的那天，钮永建才将国民政府用于武装工人的钱交出1万元，用来购买100支毛瑟枪。直到23日，即武装起义的当天，工人纠察队才拿到了枪，还没有来得及训练，就投入了起义前的就绪状态。

10月23日晚，工人纠察队在指定地点待命，等候钮永建方面的兵舰开炮作为起义的信号，准备由浦东地区码头工人纠察队首先进攻枫林桥上警察署，继而袭击高昌庙兵工厂，然后占领军阀走卒李宝章驻地的龙华敌军司令部。可是，一等再等，直到凌晨三、四点钟，也没有听到炮声。这时，警察发现了部分起义部队，开枪向队伍射击，队伍很快散开。

24日凌晨，中共上海区委向工人纠察队下令停止起义，这次没有起义的起义很快以失败告终。

由于准备仓促和缺乏经验，在钮永建的队伍与工人纠察队之间，并没有建立起严密的组织和统一的指挥系统。加上钮永建的队伍成份复杂，缺乏起码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因此起义前夕消息严重泄密，致使敌人已经有了准备。起义中有两处工人机关被破坏，一处是浦东吴家厅码头工人起义指挥部，一处是南市沪军营亲贤里机关。总工会执行委员、码头总工会副委员长陶静轩及工人自卫团指挥奚佐尧不幸被捕。

奚佐尧被捕后，关押在淞沪警察厅，敌人对他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折磨，

奚佐尧无所畏惧，敌人于10月26日残忍地将其杀害。

在狱中，敌人对陶静轩施以酷刑，妄图从他的嘴里抠出情报。陶静轩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11月16日，在被押赴刑场的路上，他慷慨激昂地向沿途群众控诉军阀和帝国主义者罪恶，劝告行刑士兵不要再当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军阀走狗，然后，从容就义，死时年仅36岁。

第一次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却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25日起，上海区委分别召开了主席团和各部委书记联席会议、活动分子会议，总结起义的经验教训。经过总结，罗亦农将这次起义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三点，他说：“一是起义没有与夏超起义相衔接，时机掌握不当；二是过于依赖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因此失却了主动的地位；三是技术准备不足。但是——”罗亦农挥动他那有力的手臂，继续说道：“起义也使我们大有所得，这就是，武装起义绝对不能依靠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真正应该依靠的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

上海暴动的第一幕已经结束，第二幕马上就要上演了。

### 三、第二次武装起义

1926年10月，孙传芳虽然扑灭了浙江夏超的独立运动，暂时稳定了江浙地区的局势，但是却无法挽救他失败的命运。11月上旬，北伐军连续攻克九江、南昌，孙传芳军队全线瓦解，向南京方向溃逃。很快，北伐军便占领了江西全省。

正当江西鏖战的时候，东路北伐军从广东潮汕地区出发，向福建方面的军阀势力展开猛烈的攻势，并于12月初攻下福州，控制了全境。

孙传芳军事上一蹶不振，军阀内部又分崩离析，其在东南的政权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在北伐形势的鼓舞下，上海工人阶级的革命热情持续高涨，中共上海区委积极准备新的起义。

有了第一次武装起义的教训，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的成员，在组织、宣传、军事等方面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

首先，上海区委重新设立了军委组织、由钟尔梅负责，赵世炎、李泊之、汪寿华协助工作。同时还重新明确了起义的指挥机构：由罗亦农负责军事，赵世炎负责党务，李泊之负责工会，汪寿华负责联络。

为了争取更多的民众参加暴动，上海区委组织力量，加强宣传工作，使武装暴动深入人心。

军事准备十分重要，但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很多活动特别是军事训练不便白天进行，只能利用晚上分头组织操练，教授射击技巧，提高军事素质。因此，罗、赵等人常常深夜还在街头巷尾穿行。

北伐军到达江西以后，没有立即东进追击，孙传芳也无力反攻，交战双

方一时处于休战状态。不久，孙传芳不甘心军事上的惨败，勾结奉鲁军阀张宗昌南下救援。消息传来，引起上海各界人士的极大震惊。

上海商总联合会、上海总工会、国民党市党部相继发表宣言，一致提出：拒绝奉鲁军南下；划上海为特别市，上海市民自治；永不驻兵；召集国民会议。宣言发表后，上海的自治运动再次高涨，并迅速扩大到苏浙皖三省。

中共上海区委及时地推动和引导自治运动，使自治运动声势越来越大，反帝反军阀的倾向也越来越明显。12月6日，上海特别市市民公会召开成立大会，使群众性的自治运动达到高潮，也为第二次武装起义作了广泛的舆论准备。

然而，正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上海革命形势日趋高涨之时，国民革命的统一战线内部却发生了深深的裂痕。

1927年1月3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在南昌非法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不顾广州国民政府已通告全国迁都武昌的决定，而决议将国民政府迁至南昌，妄图独掌大权。

同时，蒋介石利用孙传芳在江西惨败的机会，极力招降东南各省的军阀部队，扩充自己的实力。他还与帝国主义暗中勾结，企图获得各帝国主义的援助和“友谊”。随后，蒋介石逐渐扯去革命的伪装，开始对共产党和工农运动直接进行打击和镇压。

北伐战争和上海人民的不屈斗争，使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殖民统治受到严重威胁，他们深知：失去了上海就等于失去了中国，也就失去了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因此，他们也开始采取武力威胁的手段，以阻挡中国特别是上海革命的发展。

1927年1月，英国政府通过了关于派遣侵华军队的决议。24日，大不列颠帝国军务大臣发布成立“上海防卫军”的命令，上海的英租界驻军达2670人，大炮8门，装甲车8辆，飞机8架，轻重机枪40挺。

日本，法国帝国主义者也都增加了他们的驻华兵力。美国海军部则分别从檀香山和菲律宾增调军舰和士兵开赴上海。

一时间，云集上海的外国军舰达35艘，外国兵有万余人。

帝国主义试图通过武力威慑加紧控制上海，更表明了他们在革命风暴来临前的无比恐惧，也坚定了中国共产党举行第二次武装起义的决心。

面对急剧变化的政治形势，罗亦农在1月25日上海区委工作会议分析说：“现在局势很紧，也许蒋介石到了上海，就会正式攻击共产党。我们要赶快准备，发动以工人为主的武装暴动，显示民众的力量。”

2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制定了武装起义的总方针。在中央的指示中，鲜明地提出了两点意见：一是不要使目前的斗争简单地成为共产党与国民党间的斗争，还要联合国民党左派；二是在联合的同时，要自觉主动地肩负起领导革命的责任，使自己立于主体地位。

1927年2月17日，北伐军攻打杭州，守城之敌闻风丧胆，弃城而逃。



捷报传来，上海人民受到极大的鼓舞，工人阶级更是精神振奋，斗志昂扬。

18日，上海总工会召开全市各工会代表会议，有500余名代表出席。正在开会当中，得到北伐军已到达浙江嘉兴的消息。一下子，群众沸腾了，大家一致要求第二天即举行总罢工。

19日，上海总工会发出总罢工令，提出：“罢工响应北伐军！罢工打倒孙传芳！民众政权万岁！工人自由万岁！工人团结万岁！”

早晨6点，全市罢工开始了。各大工厂停工，电车停驶，轮船不开，邮局关门、南京路上的百货商店也相继“打烊”（即关门），整个上海处于瘫痪状态。

孙传芳所属第八师第七十六混成旅旅长李宝章，因镇压夏超起义和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有“功”，被提升为第九师师长，并出任上海防守司令，当他听到工人罢工的消息后，气急败坏，立即与帝国主义在上海租界的行政警务机构上海工部局相勾结，达成所谓“联防”的协议。也就是说，帝国主义军队可以越出租界布防，给军阀壮胆；李宝章的军警也可以进入租界，随意搜捕革命志士。

一时间，在华界和租界的大街小巷，到处都贴满了“遇有煽惑罢工者格杀勿论”的布告。背负着大刀、军警，沿街梭巡，任意搜查行人。在短短的几天内，有100多名所谓的“不安分子”在租界内遭到军阀当局的逮捕，有些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的人，被就地斩决。

敌人的残暴，吓不倒革命的群众。为了和敌人周旋，工人们将宣传队分成两批。前一批上街高呼口号，有意吸引大刀队来追捕，第二批宣传队趁机贴标语、发传单，等敌人回来时立刻撤走，搞得敌人顾此失彼，处处扑空。

20日，即罢工的第二天，罢工人数激增到27万5千人；21日，又增加到35万人；22日，罢工人数达到36万人以上，不仅纺织、海员、五金、机器、印刷、市政、邮局等组织产业工人，几乎全部参加了罢工，就连南货、酱园、米业、药业等分散的行业工人，手工业工人，也纷纷投入了总罢工。其发展范围之广，参加人数之多，组织之严密，在上海乃至全国都是前所未有的。

上海防守司令部眼见罢工来势汹涌，加紧了镇压和屠杀。20日下午，上海大夏大学的学生在曹家渡宣传，遭遇李宝章的大刀队。大刀队不由分说，直奔正在演讲的陈骏、陈亮而去，面对明晃晃的大刀，陈骏，陈亮愤慨地喊道：“军阀无道，亡时不远！”残暴的大刀队不等他们说完，上前砍下两人的头颅，陈亮死不瞑目，砍下的首级仍怒目圆睁，吓得刽子手不禁倒退两步，于是又上前乱砍数刀，方才罢休。随后，又残忍地将两人的头颅悬挂示众。

21日下午，李宝章将大刀队布满闸北，南市等主要地区的街道，见到散发传单的人，甚至手中拿着形同传单的市民，不论男女老少，不分青红皂白，立刻就地砍头。敌人的暴行激怒了广大的市民，部分地区发生工人与军警搏斗事件。

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共上海区委于2月20日发布了《为总同盟罢工告上海市民书》，号召上海各界市民积极行动起来，协同工人推翻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军阀的统治，建立民众政权，创建独立自由的新上海。

21日，罢工已经达到高潮，群众被广泛地发动起来了，武装起义的时机已水到渠成。于是，上海区委决定，由总同盟罢工转入武装起义。在中国共产党的策动下，孙传芳所属海军中的“建康”、“建威”等军舰也准备参加起义。起义前计划，以起义兵舰炮击兵工厂和李宝章司令部为起义信号，浦东方面百余人组成的队伍驾驶小轮驶近军舰，取得枪械，上岸攻打高昌庙兵工厂。与此同时，各区分头缴械军警武装，占领龙华军阀司令部。

22日中午，由上海工商学各阶级，以及革命政党、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代表11人，组成了“上海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

起义定于晚上6时开始，而“临委”的会议直到暴动前半小时才召开。作为“临委”之一的钮永建，因为对共产党是否要在起义后建立工人政府存有戒心，因此迟迟不肯下达暴动命令。

6时整，“建康”、“建威”两舰发出起义信号，但由于组织仓促，小轮没有按原定计划出动，因此纠察队未能接到枪支。钮永建控制下的便衣队和商团也按兵不动。这时，南市与闸北的部分工人和市民开始袭击军警，试图夺取武器，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斗。其他各区域的大队工人、群众也多次向军警防线和步哨袭击，夺下少量枪械，双方互斗数小时，相持不下，警察不敢追击，群众安然而退。

23日上午，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估计暴动难以成功，为避免损失过重，从长远考虑，决定停止暴动。

24日早晨，上海总工会发布复工命令和宣言，表示：“本会鉴于奋斗之时方长，不宜孤立作战，致损失过甚，特命令全体工友，于本月24日午后1时，一律复工，养精蓄锐，准备更大奋斗！”“现在的复工，非因退让而复工，是为准备更大的斗争而复工！”

由于起义前没有广泛地宣传要夺取政权，第二次武装起义又失败了。尽管如此，这次起义却充分地显示了工人主力军的作用。资产阶级在罢工和起义时畏首畏尾，大资本家虞洽卿甚至十分不满意把他的名字列入“临委”，并公布于报端。国民党钮永建的命令毫无效力。苏浙皖三省联合会的一些知名人士，由于受到通缉而逃之夭夭。相形之下，工人队级的英勇无畏，奋不顾身，证明了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充当起义的主角。

#### 四、不屈不挠 重整旗鼓

上海两次工人武装起义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并不因此而偃旗息鼓，而是抖擞精神，没有间歇地投入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之中。

此时，同第二次起义相比，上海的客观形势有了两个重要的变化：

第一，北伐军势不可挡，在控制了江西、浙江两省和安徽大部分地区之后，其前锋已逼近江苏南部，攻打上海指日可待；

第二，原先盘踞在苏、浙、皖、赣、闽五省的军阀孙传芳，经过北伐军多次的沉重打击之后，已经没有昔日的威风，在万般无奈中，只得投靠统治着东北和华北等广大地区的奉系大军阀张作霖，请求他派兵南下援助。

2月14日，直鲁联军张宗昌受张作霖之命，派遣第八军军长兼渤海舰队司令毕庶澄前来上海，接替原先驻守在上海的李宝章部。

毕、李两部换防之际，上海防务纰漏重重，给工人武装起义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毕庶澄军一个旅，约陆军2000人，陆战队1000人。偌大的上海，仅靠3000兵力，既要对外抵抗北伐军，又要对内防御工人武装起义，真是左右支绌，捉襟见肘。同时，毕庶澄部初到上海，人生地不熟。军心又严重不稳，因此这支队伍战斗力很差。此外，尽管毕庶澄本人杀人如麻，却常常顾影自怜，自夸是“周公瑾复生”，到上海不久，即沉湎于灯红酒绿、声色犬马之中。他的部下更是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引起上海市民的极大反感。

随着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势力认为，该是将昔日的盟友一脚踢开的时候了，于是加紧了在革命阵营内制造分裂和摩擦，伺机篡夺革命果实。

为了寻求靠山，培植自己的势力，蒋介石一面派密使与日、美、英等帝国主义联系，向其表示：只要列强支持他反共反俄和镇压工农运动，那么他们在华的一切利益将得到保护；一面则搜罗包括官僚买办、土豪劣绅，地痞流氓在内的各种反动势力。

3月9日，蒋介石唆使爪牙杀害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坚和吉安总工会委员长梁一清。17日，他指挥地痞流氓，袭击了九江市总工会。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面目已经毫不掩饰地暴露出来了。

在经历了两次武装起义的失败之后，一方面，上海的工人群众热情不减，他们养精蓄锐，积极准备，迎接新的战斗；另一方面，革命阵营内已出现严重危机，已经失去了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鉴于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决定，选择合适时机，独立领导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建立一个民众的政权。

为了加强对起义的军事领导，中国共产党派出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具体负责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军事组织和指挥。刚刚29岁的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较早认识到武装斗争重要性和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杰出领导人之一，具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和卓越的军事才能，由他担负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重任，极大地增添了党内同志对起义胜利的信心。

2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指导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特别委员会的主要成员除周恩来外，还有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区委组织部长赵世炎、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等。特别委员会是武装起义的最高决策和指挥机关，担负

起义的全部领导任务。

会议还决定、建立特别军事委员会，加强对武装起义的军事领导。特别军事委员会以周恩来为首，成员有顾顺章、颜昌颐、赵世炎、钟尔梅。周恩来指出：“为了在全市的工人武装中建立统一的指挥系统，各部委也要建立军委，负责各区的军事工作，以加强各区工人纠察队的领导。

此外，还成立了特别宣传委员会，加强政治宣传工作。

特别委员会成立后，便紧锣密鼓地投入了紧张的筹备工作之中。由于情况复杂，特委会先后召开了 31 次会议，几乎每天都召开会议，有时一天开两次会，分析形势，研究问题，制定办法。第三次武装起义中的一切重大问题，都是经过特委会集体讨论，统一认识，然后作出决定，并具体分工贯彻执行的。关于起义的军事计划，起义的指导方针，如何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如何与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等问题都是在特委会的直接领导下制定的。

特委会是个团结精干、很有战斗力的集体。特委会的成员个个才华横溢，精力充沛，往往白天开会，晚上做出决议，第二天就能传达到积极分子中，在起义的准备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鉴于工人是武装起义的主体，特委会将恢复和发展工会组织作为当务之急。首先恢复和发展了上海总工会常务委员会，然后增加新工会，发展新会员。为使产业门类繁多的工人统一步调，又将全上海划分为 22 个产总，最后提出工人总同盟罢工的 22 条政治、经济要求。

第三次起义前的组织工作做得很细致。为了避免起义中出现指挥混乱，工人找不到领袖，罢工后一哄而散局面，罗亦农在 3 月 4 日晚上的特委会中特别提出：“既然已经宣传为暴动而罢工，罢工后就要组织工人立即冲上街头，夺取武装，转入起义。”众人都同意这个观点，纷纷提出自己的意见，并将此决议落实于具体的组织工作中。

鉴于前两次武装起义中，缺乏群众性的政治宣传工作，减弱了起义的声势和力量，因此特别宣传委员会成立后，在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委员，宣传部长尹宽的带领下，决定加大思想宣传力度，使工人领导市民政权的思想普及到一般群众。

根据这一精神，特别宣委一成立，就立即发布了为上海总同盟罢工和告民众书和告工友书，揭露军阀刽子手孙传芳、李宝章屠杀工人及革命民众的罪行。此外，还制定了政治宣传大纲，指导各级组织和革命团体开展政治宣传工作。

为了使宣传工作深入人心，特别宣委针对不同的阶层人民，确定了不同的宣传口号和内容。例如，一般市民和商人对于南下鲁军使用军票、而将军费分摊到普通市民身上的做法深恶痛绝，因此特别宣委提出了“反对鲁军使用军用票”的口号；对工人宣传时，则根据前两次起义许多工友被残害的情况，提出了“推翻反动派，为死者报仇，建立市民政府”的口号。

为将宣传口号和内容在工人和市民群众中广泛传播，特别宣委创办了各

种报刊，如《平民日报》、《市民通讯社》、《工人快报》、《每日通讯》等，内容新，出版快，传播广，影响大。此外，在特别宣委的领导下，总工会、青年团、妇联、学联等分头组织了宣传队、演讲队，深入到大街小巷，进行鼓动和宣传。

经过这样的宣传，中国共产党确定的总口号——“罢工、罢市、罢课、武装暴动，打倒直鲁联军，响应北伐军，建立上海革命民众市政府”，已经广为人知。

周恩来领导下的特别军委，在军事方面更是做了周密的准备。2月24日晚，周恩来在特委会上做军事工作报告，分析了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情况，说明起义的依靠力量有三支，即：工人纠察队、自卫团和特别队。接着，他就军事准备工作提出了详细的意见，他说：“目前要做的具体工作，一是加强队伍的训练，二是从事策反工作，三是检查准备武器，四是做好情报工作。”

为了落实各项措施，周恩来带领军委成员，深入实地，察看地形，了解情况，解决问题。他还从到达浙江的北伐军中调来共产党员、黄埔一期毕业生侯镜如，让他分管起义前上海工人纠察队的训练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军事工作卓有成效。有1800名纠察队员可以较好地使用武器；驻沪海军司令杨树庄经过做工作，率部正式归附国民革命军。

当时，闸北商会会长等一些资本家组织了保卫团，特别军委决定派不公开身分的纠察队员参加。开始，有的纠察队员想不通，问：“让我们参加保卫团，难道去保卫资本家？”周恩来哈哈一笑。问道：“我们现在缺什么？”纠察队员说：“缺长枪。”周恩来说：“保卫团不仅有长枪，还有制服。我们打进去，是为了把枪掌握在我们手里。而且，我们还可以利用保卫团这个合法地位进行军事训练、掩护我们有关起义的其他准备工作。”经他这么一说，纠察队员茅塞顿开，100多人高高兴兴地参加了保卫团。他们白天作为保卫团员刻苦训练，晚上则将掌握的武器带回家中训练工人纠察队员，大大地加快了军事训练的准备工作。后来，当起义爆发时，这些参加保卫团的纠察队员把枪带出来，在攻打敌人的据点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第三次武装起义前的军事准备是极为细致的。在特别军委制定的作战计划中，要夺取敌人的主要目标是什么，每一次具体目标攻击的方法是什么，估计有几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每种情况出现后用什么样的解决办法，等等，都搞得极为详细，重点地区还制定了第一号和第二号两种作战计划，周密的军事准备，为起义致胜起了保证作用。

## 五、排除干扰 定下起义决策

抓准起义的时机，是起义胜利的关键。第一次武装起义是在夏超战败，误信九江攻克传闻时发动的；第二次武装起义是在总同盟罢工后第三天才发动的，两次起义在时间上的选择都不恰当，因此贻误良机，致使起义失败。

在3月3日的特委会上，有的同志提出：“这次起义一定要把握好起义时机。标准有两个：一个是上海已无驻兵；二是北伐军到松江后仍继续前进，或待其到达龙华。”周恩来说：“我看北伐军攻下松江或者苏州就可以发动起义。”经过集体讨论，特委决定：如果松江攻下，或苏州攻下，或麦根路与北站兵苏州撤退，三个条件具备其一，就决定发动起义。

中国共产党一直对北伐军的力量相当重视，但进军东南的北伐军在蒋介石的指示下，一直拒绝与上海工人发生联系。

周恩来负责特别军委的工作后，曾利用他在国民革命军中的影响，想方设法与北伐军取得联系。2月25日，特委会议在定下发动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后，决定派总工会代表去北伐军东路军指挥部，直接向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报告上海工人罢工的意义，敦促他们从速进兵上海，配合暴动，同时派人与第二军联络。26日，周恩来亲自写信给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劝他继续前进，并向他说明上海罢工的情况，特别将武装起义“响应北伐军”的口号告诉他。27日，上海区委召开党团会议决定，派出代表以上海市党部和江苏省党部的身分到杭州欢迎北伐军。

但是，老谋深算的蒋介石，并不急于进军上海，而只是在外围列阵，保持对军阀统治的威胁，其目的无非有两个：一是可以拖延时间，借机与帝国主义暗中联络，谋求达成某种政治交易；二是他不愿意让共产党直接领导和影响下的上海工人，借北伐军的军威发展力量。

3月3日，蒋介石给北伐军总指挥部发了一份密电，指示：北伐军如攻上海，至龙华，南翔、吴淞之线为止，军队不越此线为妥。听说某党有上海革命政府的组织，对此应勒令取消。

3月上旬，北伐军在经过几天的观望之后，分两路进逼上海；一路由西向东，经宜兴取常州；一路从南向北，由嘉兴攻松江。特委会感到，整个局势越来越紧迫，起义的时机也越来越迫近了。

对于北伐军进军上海，国民党驻沪全权代表钮永建开始持“迅速进军”的态度，他亲自写信给蒋介石，提出包抄上海和南京的计划。蒋介石收到计划后，大动肝火，斥责钮永建无能，并怀疑他是否已被共产党赤化。以后，钮永建逐渐领会了蒋介石的意图，对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不仅表示出不支持的态度，而且常常表示反感。原先钮永建曾答应支持暴动的经费，迟迟不肯拿出，后来勉强同意给铁路工人罢工5000元的帮助，其余不愿拿出。

3月18日，北伐军的前锋到达松江，革命形势有利，上海工人准备立即罢工，钮永建则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向中共上海区委宣布：“我代表蒋总司令，不赞成罢工。”

但钮永建对于得到上海罢工的领导权还是颇为热衷的，他通过杜月笙等人，想方设法拉拢毕庶澄投降，以求增加自己的政治、军事砝码，只是由于毕庶澄所提条件过高，这场策动倒戈的活动，才慢慢地冷落下来。

中国共产党已经下定了独立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心，但还是积极争取钮永

建方面同意工人举行武装起义。3月5日，罗亦农主动去找钮永建，婉转地提出：“钮先生，现在工人情绪高涨，不可抑制，我看罢工欢迎北伐军，罢工维持上海治安，防止打劫，未尝不是好事。”钮永建找不出反驳的理由，沉思片刻，终于同意不反对工人举行总罢工，只是表示：李宝章已退南通，毕庶澄退苏州，松江已下，这样暴动就无对象，并说工人暴动是应该的，但不要徒然牺牲。

尽管钮永建表示不反对工人举行总罢工，但在召开市民代表会议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同钮永建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并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对于市民代表会议的性质，中国共产党明确指出：市民代表会议是民众的直接政权，必须以工人阶级为主体。钮永建方面则提出以党治国或委任制，试图夺取市民政权的领导权。

基于在本质问题上发生分歧，双方在代表名额、代表产生的方式等方面矛盾重重。比如，在选举的方法上，中国共产党主张以职业为单位：国民党方面则主张以区域为单位。如果按后者选举，无业流氓，土豪劣绅、反动官僚都有机会当选为代表，对革命不利，对此，中国共产党坚决不妥协、不让步。

为了在北伐军到来之前，造成浓厚的民选气氛，中国共产党一边与国民党又联合又斗争，一边以最快的速度开展市民代表会议工作。

3月6日，《上海市民代表会议之组织法及其职任（拟）案》制定出来，经上海总工会、上海学联、全国学总、苏浙皖三省联合会及各马路商联合会五大团体的联合会议通过，开始付诸实施。上海的民众已经全面发动起来了。

3月中旬，北伐军攻克宜兴、溧阳之后，开始向上海进军，逼近松江。一时间，上海群情高涨。13日，沪宁、沪杭两路的工人举行了罢工，毁坏了沪宁路常州至南京的铁路，使敌人得不到增援，陷于孤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时机到了！

3月18日，松江发生激战，宜兴已被攻下，在起义时机完全成熟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不再理睬国民党右派的干扰，决心义无反顾地举行武装起义。

19日清晨8点，上海区委主席团召开紧急会议。会议一开始，周恩来就目前的形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目前形势于武装起义有利，但毕庶澄有可能迅速败退，也有可能做最后的挣扎。所以如果罢工后面没有武装起义，就会受到镇压。”

与会的其他主席团成员纷纷点头，表示同意周恩来的看法。

周恩来接着说道：“我的意见是，迅速做好准备，一旦有毕军溃退的消息，即一面下令罢工，一面准备武装起义。”

在革命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决定牢牢掌握武装起义的领导权。

9时，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大会，赵世炎在会上做了《革命的现状与我们的责任》的报告，指出：“目前革命的潮流与现象，就是民众运动。我们党现在还不是抓得民众运动的最高领导权。……我们的责任必须是要拿住

民众力量。”

随后，罗亦农在会上做演讲，他情绪饱满，慷慨激昂，对与会的活动分子说：“现在，我们的党已到了领导夺取政权的时期，每个同志都应该挺起胸膛，做革命的领导者，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丝毫不能退让。”他的演讲赢得了活动分子的一片掌声。

下午2点半，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及各产业总工会联席会议，罗亦农在会上下达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预备动员令。

晚上7点，上海区委再次召开特别会议，研究上海形势和准备市政府成立问题。

当日，中共上海区委还发布了《行动大纲——总同盟罢工应注意之点》，对上海的民众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20日上午8时半，上海区委再次检查暴动的准备。罗亦农对各部委、各产业总工会的负责人说：“目前统计的罢工人数是28万，跟上次差不多。各部委，各产总还要继续做工作，争取罢工人数至少到五六十万人。”

各方人员分头去做最后的准备，只等一声令下，一致行动。

## 六、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光辉胜利

3月20日傍晚，北伐军攻入上海近郊新龙华，中共上海党组织决定立即举行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并在宝山路横滨桥南商务印书馆（即东方图书馆）职工医院内，设立了起义前总指挥部。

从3月20日傍晚到21日凌晨，起义总指挥周恩来，副总指挥赵世炎彻夜不眠。周恩来身穿一身灰布棉袍，头戴一顶鸭舌帽，围了一条深灰色围巾，西装裤子黑皮鞋，完全是一个平凡朴素的地下工作者的打扮。在总指挥部的西厢房里，桌上放着一张大幅上海市区地图。周恩来一会儿趴在桌上，认真看着地图，在上面圈圈点点做上记号，一会儿和赵世炎边指划边交换意见，不时地有联络员从外面进来，向他俩汇报情况。周恩来和赵世炎听完汇报，当即断，迅速做出指示，指挥下一步的行动。

3月21日凌晨，中共上海区委发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指令。根据党的指示，上海总工会发出了总同盟罢工的命令，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常务委会立刻举行紧急会议。会上，罗亦农代表中共上海区委宣布于当天中午12时举行总同盟罢工，并立即举行武装起义。

各区的工人纠察队、宣传队、救护队、慰问队等工人队伍，按总工会的命令，开始了有组织的行动。

当时钟指向正午12时，一场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民罢市的总同盟罢工开始了。上海共有工人125万人，其中有80万人参加了罢工。仿佛有一种神奇的外力，使一座偌大的城市在极短的时间里凝固了：工厂隆隆的机器声听不见了，街上商贩的叫卖声听不见了，连平日跑得欢实的汽车、火车也都



不见了气息……

然而，只是在很短的寂静之后，整个城市又进入了另一种有生机的状态。所有的工厂、作坊、机关、大小商店、车站、轮埠、码头等全体工人，纷纷到预定的地点集合。各工会执行委员分头在集合地点，向工人说明了此次罢工的意义。广大工人和纠察队员磨拳擦掌，他们早就盼望这一天：自己起来解放上海，当家作主人。这一天终于到了！

随后，工人们每二人一排，排成绵延数里，不见头尾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向前进发，沿途由纠察队维持，秩序井然。

跟随游行队伍同时出发的还有宣传队，他们沿着马路宣讲，每至一处，都吸引了数百名围听者，致使马路被塞，水泄不通。被鼓舞起来的群众源源不断地加入了游行队伍。

全上海的民众都行动起来了！革命的歌声此起彼伏，口号声响彻云霄。平日里耀武扬威的反动军警，如今都蜷缩在自己的巢穴里，不敢再出来逞威风了。那些帝国主义的巡警，战栗地伫立在租界华界交界处。租界里的外国士兵纷纷出动，他们荷枪实弹，如临大敌，戒备森严。

根据预定的计划，总罢工以后，立即转入武装起义。这次武装起义的行动，除租界以外全市分七个区进行，即虹口、南市、浦东、吴淞、沪东、沪西和闸北。武装工人向盘踞在上海的军阀武装发动了猛烈攻击。一时间，枪炮声和群众激昂的口号声交织在一起，震动了整个城市。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战斗打响了！

虹口是工人起义最先发动的地区。该区三面与租界接壤，一面临近市郊。毕庶澄在这儿没有驻兵，只有警察署。以烟厂、机器厂、丝织厂、邮局工人为主组成的纠察队，集中力量，一举攻占了虹口区警察署，夺取了大部分枪支弹药。

绰号“铁胳膊”的流氓头子孙介福，平日里倚仗警察署的势力为非作歹，不可一世，此时看到警察署被工人占领，一想昔日狐假虎威的日子将一去不复返了，气急败坏地纠集一批地痞流氓，气势汹汹地向起义工人扑来，狂妄地叫嚣：“还能让工人臭小子们得了势？要替警察报仇。”英勇的起义工人岂能被几个地头蛇的嚣张气焰所吓倒，他们毫无惧色，猛烈痛击这群乌合之众。一时间，虹口警察署门前枪声响起一片，蜂拥而上的流氓被打得吱哇乱叫，抱头鼠窜。孙介福一看势头不对，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只是一边仓皇逃跑，一边还色厉内荏地叫嚷着：“好汉不吃眼前亏。你们，你们等着瞧……”

起义工人占领警察署，打退敌人的反扑后，开始行使当家做主人的权力，维护虹口区的秩序。

南市区的起义工人由法商电车电灯自来水公司、华商电气公司、法商新造船厂等厂工人为主的纠察队，联合二三十个资本家办的保卫团组成。

声势浩大的起义队伍首先进攻南市区警察署，署内的警察，平日穷凶极

恶，横行霸道，如今见到潮水般涌来的武装工人，顿时吓得丧魂落魄。有的警察换掉衣服，夹在人群中偷偷溜走；来不及逃跑的警察，早已面如土色，无任何抵抗能力。接着，起义队伍又攻下淞沪警察厅及其所属的一署三所、电话局，随后攻下江南造船厂、高昌庙兵工厂、南火车站。到下午5时半，整个南市区都被起义工人占领。

浦东的大部分地区，由孙传芳的游巡队驻守，进攻难度较大。工人纠察队将主攻目标首先对准烂泥渡的第三区警察署，准备夺取枪枝弹药后再进攻战斗力较强的敌游巡队。起义队伍兵分三路：第一路封锁江口，防止敌人乘船逃跑；第二路经花园石桥，从后面包抄；第三路从正面进攻。被围困在院子里面的警察如瓮中之鳖，进退不得，满耳都是“缴枪不杀”的呐喊声，150名警察乖乖地举起了手，150条长短枪很快转移到工人手中。

随后，夺取了武装的工人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将孙传芳先前设在各处游荡杀人的巡查队一一消灭，乘势又攻占了三区警察署的一分所及二分所。

浦东起义胜利后，起义工人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浦东临时保安局，对浦东武装布防。

吴淞地区既有原驻守炮台阵地的敌兵，也有新从前线溃败下来的毕庶澄残部。因为吴淞交通方便，可以从沪宁线撤离上海，也可以从码头经水路逃离。铁路和纱厂的工人，集中精力围攻驻军，并很快夺取了他们的枪械，随后，又对企图从水路逃跑的毕庶澄残部，进行了火力阻击，直打得逃兵惶惶如丧家之犬，不愿意白白送命的，都举手表示投降。

吴淞工人起义胜利后，召开了区人民代表大会，领导10万群众，行使区政府权力。

在沪东地区，租界和华界的工人都参加了起义。起义开始后，工人们迅速占领了虹镇、胡家木桥和香烟桥警察所，然后准备攻打江湾警察署，警察一听到工人来了，吓得闻风丧胆，连厨房里刚蒸好的馒头也来不及吃便仓惶而逃。接着，杨树浦和引翔港两地工人分头召开群众大会，到会人员达到5万余人。会后，大队人马整好队，雄赳赳地开出租界，奔向闸北斗争前线。

在沪西地区，群众罢工后，先后围攻并占领了曹家渡第六区警察署、四区警察署以及警署第二分所等处，全部予以查封。

以上6个区的武装起义，由于起义工人的英勇战斗，进展得比较顺利，当天晚上基本结束了战斗。此时，最激烈的战斗尚在闸北进行。

毕庶澄部的鲁军为便于撤退，将主要兵力都集中于火车站所在的闸北区，设立了湖州会馆、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北火车站等20多个据点，配备有机枪、大炮、装甲车等新式武装。在宝山路和北河路交界处，还有帝国主义租界当局的重机枪阵地。在毕庶澄的部队，还雇佣着一部分懂军事的白俄罗斯军人。起义工人开始行动后，北火车站的敌人大炮对着市镇袭击，白俄军以铁甲车开炮射击，混战中，英帝国主义的铁甲车也乘机开炮射击群众。

闸北起义的主要力量是商务印书馆、邮政、电气、铁路等部门的工人，

还有上海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组成的学生纠察队。他们面对凶残的敌人，完全置生死于度外，勇敢地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不到4点，攻下了湖州会馆及三处警察署。周恩来决定将指挥部由商务职工医院移至第五区警察署。

4点钟左右，一个重要情报被送到总指挥部：毕庶澄的500名士兵，全副武装，并备有轻机枪数挺，早晨乘一列铁棚车开往吴淞，准备从海上逃跑。当列车行至吴淞附近，发现吴淞已被工人纠察队占领，赶紧掉头返回上海，此时列车正行进在驶往上海的方向。

周恩来接到情报后，立即召集会议研究方案。周恩来果断地表示：“决不能让这辆列车进入上海。如果让它进来，第一，将冲破我们的虬江路防线，第二，列车上的武装进入北站，会增加我们攻击的难度。”他离开座位，来到地图前，当机立断：“选择靠近市区的天通庵车站附近组织伏击。”

周恩来调工人纠察队第一中队和第四中队一个小队来到天通庵，先将路轨的道钉拔掉，然后，在铁路两侧选择有利地形，构筑简单工事，就地埋伏。

黄昏时分，列车进入伏击圈后突然出轨翻车，早已埋伏好的工人纠察队，立刻以密集火力发动了猛烈射击。列车上的敌人被突如其来的打击搞得晕头转向，好半天才明白过来是列车出轨了，可是车门反锁紧闭，无法打开，只能借助窗口负隅顽抗，坚守待援。

天渐渐地黑了下來，敌军虽有一部分下了车，但被增援的沪东，虹口工人纠察队，学生纠察队的火力所阻，还是动弹不得。与此同时，周恩来组织群众，对困军发动了政治攻势，力劝他们“缴枪得生”、“赶快投降”。

经过一夜的僵持，又累又饿，军心涣散的敌兵终于挺不住了，火力逐渐转弱。天亮后，除少数人溜掉以外，其他400多人挂起了白旗，丢出枪枝，不战自降。

在周恩来的安排和指挥下，天通庵车站伏击战胜利结束，这不仅消除了工人纠察队腹背受敌的危险，而且极大地鼓舞了正在闸北与敌浴血奋战的上海工人阶级的士气。同时，被缴获的武器弹药用于支援正在围攻北火车站的纠察队，增强了他们的战斗力。

敌人重要据点之一的商务印书馆，地处宝山路中段，是起义总指挥部和北火车站的必经要道，地理位置很重要。商务印书馆俱乐部由四层楼钢筋水泥建成，加上敌人的军需处设在这里，武器先进，子弹充足，因此，虽然只有一个排的驻兵，但易守难攻。总攻开始后，敌人以密集火力顽强扼守，使起义工人遭到很大伤亡。

周恩来听到情况汇报后，立即赶来察看地形，他制止了部分工人要利用梯子和搭起的桌椅爬越围墙，向里硬冲的做法。他说：“你们这样上去跳墙，容易暴露，牺牲太大。”在搞清了地形情况后，周恩来指示工人，改强攻为“围而不打”，部署火力，严密监视，敌人一露头，便予以猛烈射击。

到22日下午，被重重围困在据点里的敌人等不到外援，走投无路，在纠

察队的政治喊话中，只好将白毛巾扎在竹竿上伸出墙外，向起义工人表示投降。但是，工人纠察队由于缺乏经验，没有搞懂对方的意思，仍继续进攻，结果又牺牲了6个人，周恩来知道了，立即命令停止战斗，接受对方投降。随后，周恩来将起义总指挥部迁入商务印书馆。

这时，敌人只剩下最后一个，也是最顽固的个据点——北火车站。

为了尽可能地减少伤亡，周恩来对北火车站的战斗作了周密的部署，他指示纠察队员在轻机枪的掩护下，在虬江路至北站之间修起三道防御工事，在激烈的战斗中，宝山路东侧的居民住屋被敌人铁甲车上的迫击炮及租界方面的重机枪击中起火，火借风势，很快蔓延开来。周恩来立即组织起义工人救火，帮助居民抢救物资，并有秩序地转移疏散。敌军乘机发动出击，密集的炮火使起义工人被迫退出防御工事。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周恩来率领一支突击队冲了上去，会合前线起义工人猛烈回击，夺回了防御工事。在火力的掩护下，居民区的大火也被扑灭。

下午4时左右，毕庶澄见大势已去，换上便装，偷偷地逃进了租界。残军无心再战，已近土崩瓦解。

5时，沪东、沪西、闸北的工人纠察队，按照总指挥部发出的紧急命令，分三路到虬江路宝山路口集合，准备对北站固守之敌人发起总攻。周恩来站在三叉口的高地上，对工人们说道：“现在敌人2000多人集中在这里，被包围了，逃不掉了！英勇的纠察队员们，准备发起总攻，在6点前攻占北站，结束战斗！”

下午6时，各路汇集到闸北的起义工人，向这里的敌人发起猛烈进攻，在震天的冲杀声中，敌人全部被打垮，起义工人终于占领了闸北火车站，取得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最后胜利。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在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及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上海工人经过周密细致的准备，抓住有利的起义时机，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英勇无畏地进行战斗，并不断地用夺取来的敌人的武器武装自己，终于打败了武器精良的反动军警，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了上海。周恩来作为起义的总指挥，在准备、发动和领导这次武装起义中，周密严谨，决策果断，指挥若定，显示了卓越的组织才能和军事才华。同时，他置生死于度外，亲临战斗现场，解决实际问题，对起义的成功起了重要作用。

## 七、建立上海特别临时政府

3月22日上午，上海各区的武装起义已告胜利，北洋军阀的反动军警已基本肃清，虽然闸北地区的起义工人还在与毕庶澄残部激烈博战，但上海人民的武装起义已经胜利在望。9时，上海市民代表在新舞台召开了第二次市民代表会议。簇拥在会场的4000多名代表，分别来自全市千余个团体。在十分热烈的气氛中，宣告新的上海市民众政权——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成立，选举产生19名临时市政府执行委员，其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10名，占半

数以上，战火中诞生的上海市民政府，在其组织领导和组织成份上实现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权。

上海临时市政府的成立，是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一个直接成果，也是工人武装起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经解放了的各区工人、市民纷纷涌向街道和广场，庆祝上海人民的胜利，欢呼新上海的诞生。

3月22日下午，当毕庶澄残部据守北火车站作最后挣扎的时候，上海人民确信：工人起义胜利的时刻就要到来了！市民们为了庆祝胜利，争先恐后地购买红布、红纸和鞭炮，绸布店和杂货店门前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广大的工人、学生、店员，自发地形成了一支游行队伍。他们高举着红旗和标语，鞭炮声、欢呼声、口号声交织在一起。这是多少年来上海人民难得的一个盛大节日。

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屈不挠，终于取得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他们昂首挺胸，扬眉吐气，他们欢欣鼓舞，倍感骄傲。

起义胜利后，长期处于半公开状态下领导工人斗争的上海总工会迁入闸北湖州会馆正式公开办公。只见宽敞的湖州会馆焕然一新，会馆门口高悬红布白字的“上海总工会”横幅，10多名武装纠察队员立于门前。络绎不绝前来祝贺的工会代表高呼口号，与爆竹声相应和，呈现出一派喜庆热烈的气氛。

随后，汪寿华等总工会负责人开始办公。他们部署各级工会的工作，指导工人纠察队的组织与训练，解决工人与资本家间的纠纷，维持上海市的社会秩序，开始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

3月29日，上海特别市政府在新舞台召集代表大会，举行市政府委员就职典礼。出席会议的代表有5000余人，市民政府委员13人，秘书长林钧宣布大会正式开始，报告了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已批准成立市民政府的决定。与会代表热烈鼓掌，欢庆新生政权的诞生。随后各委员立于台前，宣誓就职，然后上台祝词并发表就职演说。

下午5时，23位委员在邮务公会军乐队的护送下走出会场，在上海市政府（前上海县公署旧址）门口留影。当晚6点，上海特别市市民政府召开第一次委员会会议。

由上海市民代表会议直接选举产生了上海特别市市政府，并有工人阶级的代表参加政府工作，这都是破天荒的。

上海临时市政府成立后，市政委员会颁布了《上海特别市政府政纲草案》。《政纲草案》充分体现了市政府政权的民主主义性质，提出了收回租界，撤退外国海陆军，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反帝要求，以及肃清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反封建的要求。此外，《政纲草案》还提出了减轻人民负担，普及平民教育等积极的有建设性的主张。

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了，上海临时政府成立了，这是上海工人阶级的伟大胜利，也是上海人民的伟大胜利。胜利后的上海，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广大市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他们以各种方式表达着欣喜的心情，红布、

鞭炮销售一空，被看作解放的标志，革命的象征的红旗漫天飘扬；在总工会的领导下，各行各业的工人陆续复工，商人陆续复市，整个上海呈现出一派祥和、有序的景象；同时，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深入人心，大批工人参加工会，新的工会组织纷纷成立，到3月底，登记的工会组织有500多个，工会会员猛增加到80余万。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世界各地，整个欧洲的工人们，有的集会，有的游行，有的演说，他们都用不同的方式，向上海工人阶级表示祝贺。

上海的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次用自己的武装力量消灭了盘踞在上海的反动军阀，占领了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地区；打碎了上海的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由民众直接选举的上海市民政府，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它的伟大意义永垂青史，彪炳史册。

## 八、蒋介石发动血腥政变

3月26日下午，蒋介石乘坐军舰从江西来到上海。这时，各帝国主义者及上海的大资产阶级还以几分疑惑的目光审视着他的态度。蒋介石则明确表示：“本人对上海租界绝无用武力收回之意，所有上海地方秩序与中外人民财产、自由鄙人完全负责。”蒋介石的表白，暴露出他反对革命，不愿人民当家作主之心，也给帝国主义者及江浙大资产阶级吃了一颗定心丸。

在此前两天，即3月24日，北伐军中路军在南京举行入城式后，有些士兵出于民族义愤，攻击美、英、日等国领事馆。下午3时，美、英两国炮舰就突然向南京军民开炮，炸死平民15人，重伤9人；军人官兵被炸死24人，炸伤7人，造成骇世惊闻的南京惨案，而美国仅死1人；英国死3人；法国、意大利各死1名传教士，和中国死伤人数相差悬殊。

事隔一周，蒋介石在南京总部招待日、美、英、法等国报社记者，发表专门讲话，说明总部负责调查，如果的确是革命军所为，将采取相应办法，但英美军舰开炮前，并无任何警告，应赔偿损失。措词很不强硬，在帝国主义面前显得软弱无力。

同时，蒋介石积极争取上海财界的信赖与大力援助，先后从上海财界借款五百多万元。

有了帝国主义列强及大资产阶级的支持，蒋介石加紧了对上海新生政权的破坏，襁褓中的上海市民政府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3月29日，上海召开市民代表大会，政府委员进行宣誓就职。蒋介石派人送来一封信，信中表示：“在此军事期内，一切行政处理与军事政治系统攸关，若不审慎于先，难免纠纷于后。中正为完成政治统系及确定市政制度计，已另电中央熟商办法，务望暂缓办公，以待最后之决定。

在市民代表的一致要求下，蒋介石要求市政府“暂缓”成立的阴谋未能得逞，市民政府委员照常进行宣誓就职。

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又勾结流氓发出恐吓信：“限 24 小时解散市政府，否则要以最后手段对付。”以此迫使市民政府委员辞职。

蒋介石极尽无赖之能事，破坏建立上海市民政权，上海的政治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大资产阶级在革命中表现出两面性。一方面，由于他们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歧视、剥削和压榨，在革命形势高涨时，表现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另一方面，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在形势出现波折时，又表现出妥协性。

在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的压力下，大资本家虞洽卿以“体力衰弱，精神不济”为由，要求辞去临时政府委员之职；杨杏佛则借口“家母病复垂危，不得不归侍汤药”，而向市民政府提出辞职。到 3 月底，有 6 名市政府委员先后声明辞职。

大资产阶级的妥协退让，使蒋介石更加有恃无恐，更加紧了反共反人民的步伐。4 月 2 日下午，蒋介石召集手下干将，在江南兵工厂内的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秘密会议，决定早日清党反共。

5 日上午，蒋介石又召集秘密谈话会，决定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咨请有关当局，对共产党人作非常紧急处置。同一天，蒋介石下令将刚从孙传芳方面投降过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周凤歧调至上海，充当镇压工人运动的刽子手。上海周围已是一片“黑云压城城欲摧”的肃杀景象了。

大资产阶级动摇退出革命，并没有使中国共产党软弱和退让，在这风雨如磐的日子里，周恩来立场坚定，无情地揭露蒋介石的右派真面目。他说：“上海工人赤手空拳，敢于同反动军阀英勇斗争。他们有勇气，有觉悟。大资产阶级大造反革命舆论，说什么，“工人手里有枪，闻者寒心，必须收回枪械。”国民党右派也鼓噪：“工人不把枪交出来，自己会内讧。这都是无稽之谈。我们必须对此有充分的认识。”

4 月 7 日，在赵世炎、汪寿华主持下，上海总工会召开各工会代表大会，就工人武装问题作出明确决议：“现在纠察队的组织和训练已渐次就绪，此后更当加紧训练，并严明纪律。”为了对付突然事变，周恩来、赵世炎对工人纠察队作了具体部署，要求纠察队通宵值班，加强戒备，以战斗来保卫胜利果实。

慑于工人手里拥有武器，蒋介石暗筹做发动政变的各种准备，而在表面上却不动声色，甚至使用欺骗与麻痹的手段。在不同的场合，蒋介石多次“诚恳”地赞扬上海工人响应北伐军举行的总同盟罢工。4 月 6 日，蒋介石甚至派人给工人纠察队亲赠“共同奋斗”锦旗一面。

蒋介石的“友善”举动，麻痹了在斗争中还缺乏经验的上海工人阶级。殊不知，一个充满杀机的行动正策划于密室之中。

蒋介石磨刀霍霍，各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其在华利益考虑，竭力阻碍中国革命，对蒋介石政变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配合。4 月 8 日，日本军舰“出云号”上的 800 名士兵悍然登上上海租界，并排队游行。更为

猖獗的是，日本军队竟然在北四川路奥迪安戏院的屋顶架设机枪，枪口对着中国百姓。尤其不能容忍的是，4月10日下午，日本海军50余人从北四川路突然闯入华界鸿庆坊，将该坊四周围住，持着上了刺刀的枪，直奔37号2楼海员工会理货部及3楼联德总会进行搜索，临走抓走了20多人，与此同时，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上海驻兵已达20000余人，数十艘军舰在海上游曳。一时间，上海滩风声鹤唳，人心惶惶。

有帝国主义作后盾，蒋介石更加有恃无恐，9日，蒋介石颁布了《战时戒严条令》，严禁集会、罢工、游行，并任命白崇禧，周凤歧为上海戒严司令部的正、副司令。一切布置就绪后，蒋介石留下亲信杨虎、陈群在上海“督沪”，自己则避往南京。4月11日，他在南京正式下达密令：“已光复各省一律实行清党。”于是，一场罪恶的屠杀降临到了上海工人和共产党人的身上。

11日深夜到12日凌晨，在蒋介石的策划下，上海青帮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指使的大批便衣党徒，身着统一的蓝布工装裤，臂上缠着白布黑“工”字标志，手持盒子枪，从租界顷巢出动，向上海总工会会所、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商务印书馆印刷所等处放枪，骤然间南市、闸北等区枪声不断，划破了宁静的夜空。工人纠察队立即予以还击。正在这时，大批26军部队开到，将攻打工人纠察总部及各分部的流氓缴械。工人纠察队看到这种情形，开门将前来“调解”的26军迎入。谁知，军队刚一入门，立刻就变了脸色，说：“他们的枪械已经缴了，你们的枪械也得缴下来。”这样，工人纠察队员也被收缴了全部武装。在这场突然袭击中，有60人牺牲于革命营垒内部的卑鄙屠杀，220人受伤，26军占领了工人纠察队总部及分部。

4月12日清晨，各厂工人听到纠察队被缴械的消息，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怒，纷纷集会抗议。中午，闸北和南市的群众分别召开万人市民大会。会后，闸北数万名工人拥往湖州会馆，夺回了原先设置在那里的上海总工会会所；南市群众则冒雨到东路军总指挥部请愿。

13日上午10点，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了有1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后，群众整队出发，徒步到宝山路天主堂26军二师司令部请愿，要求释放被拘工友，抚恤死难烈士家属，交还纠察队枪械。

下午1时，当队伍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早已埋伏在那里的26军士兵分头冲出，轻重武器向手无寸铁的游行队伍一齐开火，由于游行队伍密集，当场即有100多人被打死，伤者不计其数，时值大雨滂沱，宝山路顿时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令人惨不忍睹。为了消灭罪证，疯狂的刽子手立即用卡车将尸首拖至郊区掩埋，其中尚有不少的重伤者在呻吟中被横拖竖拽，生生活埋。下午4时，南市由6000名工人组成的示威游行队伍也惨遭血腥屠杀。随后，上海总工会被封闭，上海特别市政府被强行解散。

从4月12日到15日，仅仅4天的时间里，上海有300多工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下落不明，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倒在了血泊之中。这



就是蒋介石发动的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4月18日，上海的共产党人与革命人民的尸骨未寒，血迹未干，蒋介石便在南京成立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政府”，登上了最高统治的“宝座”。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下，上海一片白色恐怖，任何反抗的言论举动都会招致杀身之祸。由此，上海革命跌入最黑暗的十年低谷之中。

蒋介石的血腥大屠杀，深刻地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与上海工人阶级：在刽子手面前，任何妥协和请愿都无济于事的，对待反动派，只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于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的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在极度危难之中，向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军阀展开了不屈的斗争。从4月13日下午起，上海各区各工厂的几十万工人在各级工会的发动下再次举行罢工。14日起，中共上海区委，上海总工会等机关陆续转入地下，积极开展活动。许多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坚持战斗，直至为革命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

